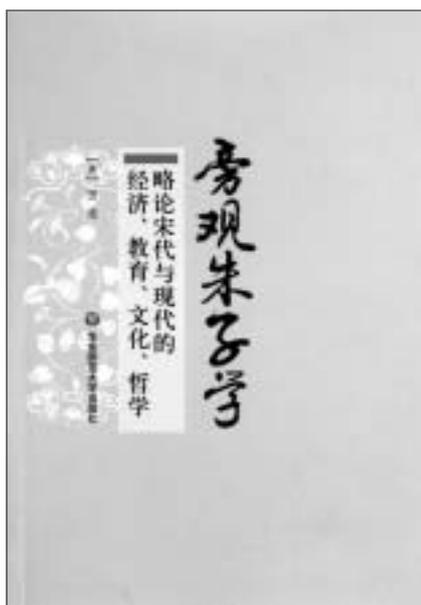


多元視野中的思想史研究

——田浩《旁觀朱子學》的方法與觀點

● 宋洪兵



田浩 (Hoyt C. Tillman)：《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作為一位漢學家，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田浩 (Hoyt C. Tillman) 教授以其獨特的研究思路和精闢的學

術見解，在中國思想史領域，尤其是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層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早年的代表作《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1981) ①，運用自己發掘的宋代善本，對陳亮及朱熹的思想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僅得到老一輩史學家鄧廣銘和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的高度評價，更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成為當代研究陳亮思想為數不多的必讀書之一。

他的另一本代表作《朱熹的思維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 1992) ②，在宋代廣闊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 (如對宋代士人設立社倉、書院，以及重訂《呂氏鄉約》之類的深入探討)，在朱熹與其同時代學者張栻、呂祖謙、陳亮、陸九淵的「關係」或「圈子」(即「道學」團體) 視野中考察朱熹思想形成、演變的歷史脈絡，無論是在方法論還是學術觀點層

田浩的新著《旁觀朱子學》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見解上都多有創獲，尤其在宋代思想的近代影響及當代價值層面，作者進行了嘗試性的研究和探討，集中體現了作者一以貫之的多元視野和客觀態度。

田浩始終堅持「按照中國歷史自身的特性來理解中國歷史」。在「以中釋中」、「以宋代思想解釋宋代思想」的方法論指導下，作者深入發掘「道學」概念及其演變脈絡，對於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厥功甚偉。



朱熹像

面，都獨闢蹊徑，從而得出諸多不同流俗的學術見解。

田浩的新著《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以下簡稱《旁觀朱子學》，引用只註頁碼）收錄了作者此前發表於英語學界而又未見於中譯本《功利主義儒家》及《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的學術論文，同時亦有作者目前正在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涉及「思潮與經濟發展」、「教育與創造力」、「模範與文化」、「哲學與思想史」、「方法與對話」等多個方面的話題。該書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見解上都多有創獲，尤其在宋代思想的近代影響及當代價值層面，作者進行了嘗試性的研究和探討，集中體現了作者一以貫之的多元視野和客觀態度，學界對此甚為關注。

一 「旁觀」立場與多元情懷

對於已然消逝的歷史，後人的回溯式研究終屬「旁觀」。在歷史研

究領域，旁觀者固然可以超越利害紛爭及個人情感而保持一份清醒，但同時亦難免因「局外人」的身份而產生諸多困惑，比如旁觀者如何能夠完全無誤地「介入往昔」從而知曉歷史情境中的「人」或「事」？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旁觀」是歷史研究領域無法擺脫的宿命。這種宿命，使得任何歷史研究者都必須在「內在（或歷史的）視角」與「外在（或當代的）視角」的張力中小心翼翼地維持一種平衡，稍有不慎，就會強古人以就我，以古人的酒杯澆今人胸中之塊壘。

田浩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認為，歷史研究的「旁觀」宿命，不僅僅是深受歐美文化傳統濡染的西方漢學家面臨的困境，同時也是其他研究者包括當代中國學者都面臨的困境，「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我們自己國家的『過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更像是一個『外國』，因為經過許多世紀的變遷，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的變化是如此之大」（頁5）。由此，一方面，他意識到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視野和問題意識必然會融入歐洲及北美的理論痕迹，這是一種外在（或當代的）視角；另一方面，他始終堅持「按照中國歷史自身的特性來理解中國歷史」，其中，首要的問題就是「按它自身的術語和文本來理解它」，這是其難能可貴之處（頁5）。在「以中釋中」、「以宋代思想解釋宋代思想」的方法論指導下，作者深入發掘「道學」概念及其演變脈絡，對於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厥功甚偉。

田浩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青睞有加，並將其創造性地引入宋代思想史研究領域：

作為我的方法論的一部分，我也尋求發現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過去的環境和思潮的概念和範疇。我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應該選擇古人所用的術語和概念，並以古人所理解的方式加以運用。

他一再強調：「至少每個人應該為自己所使用的術語給出定義、解釋自己所劃分的思想流派的含義。雖然很少有人留意我的這一觀點，但我仍然認為這是提高我們理解的基礎。」(頁6)

具體而言，田浩的研究取向，是針對當代學界包括陳榮捷、冉雲華、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等使用「新儒學」(Neo-Confucianism) 來界定宋、金、元理學時產生的理解分歧。同樣是研究金朝儒學，陳榮捷以《宋史·道學傳》定義的正統程朱學說(即《宋史》定義的「道學」)為判定「新儒學」的標準，認為金朝沒有「新儒學」。冉雲華眼中的「新儒學」則是廣泛意義上的「理學」，而非專指「程朱理學」，從而主張金朝亦有「新儒學」。狄百瑞接受「新儒學」的提法，同時認為「新儒學」比「理學」涵蓋的範圍更廣，但卻並未具體定義「新儒學」的外延究竟在何處(頁8)。

觀點的分歧源自概念使用的籠統和含混。有鑒於此，田浩力主應該以歷史文本所記載的「道學」概念而非後人概括的「新儒學」為依據，來探求宋代思想史的演變軌迹，同

時強調「道學」概念並非深受程朱理學影響狹隘化了的《宋史·道學傳》的所謂「正統」定義，而應從更廣泛的歷史文本及相關語境來考察「道學」概念(頁25)。由此，他發現了宋代思想的多元性特徵。

田浩從李心傳的《道命錄》而非《宋史·道學傳》來考察「道學」概念的演變歷史，認為從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闡揚「道學」開始，在元祐時期(1086-1094)就形成了一個廣泛的道學群體，這其中不僅包括後來正統的「道學」人物如程氏兄弟，而且司馬光及其弟子劉安世等人亦囊括在內。通過對《諸儒鳴道集》的研究，他認為南宋的張九成亦為早期道學群體的核心人物。然而，在宋乾道九年(1173)成書的《伊洛淵源錄》中，朱熹卻將張九成等重要人物排除在道學群體之外。及至朱熹將「道統」觀念引入其思想體系之後，他的學術立場進一步狹隘化，將其同時代的陸九淵、陳亮等思想競爭者排除在道學群體之外，而這些人原本應該屬於「吾道中人」的。道學群體的多樣性在「道統」觀念的影響下逐漸消逝。

對於作者的「旁觀」立場，陳來的評價可謂切中肯綮：

本書書名的「旁觀」顯示出，田浩教授所主張的，是與主流宋代理學研究突出朱熹的單線發展所不相同的另一種視野。這種視野關注宋代儒學發展的社會網絡，強調儒學思想家群體之間的多元互動，從而為宋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豐富、具體的視域和場景。(《旁觀朱子學》，封面推薦語)

田浩的核心工作，在於重新揭示並嘗試復原早期道學群體的多樣性及「朱子學」研究的開放性。這種學術追求體現在《旁觀朱子學》中，就是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從朱熹所處時代的特徵及其社會關係網絡來「旁觀」朱子學。

田浩的多元情懷，使得他對歷史上的「異端」所處的歷史境遇具有一種同情的了解，並能在歷史脈絡之中發掘這些「異端」的思想特色，從而給予恰當的分析和評價。在《旁觀朱子學》中，作者特別關注諸葛亮和陳亮。

顯然，這是一種歷史學的思想史研究理路，而非純粹哲學觀念的分析和探討，此正為田浩一再強調並一以貫之的研究方法和治學理念。

而對於作者一以貫之的「多元」情懷，余英時在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初版序言中，曾謂呂祖謙代表的寬容、開放和多元的儒家品格引起了作者的強烈關注，並認為作者本人與胡適大力提倡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取徑相似^③。這種關懷，在《旁觀朱子學》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旁觀朱子學》貌似以「朱子學」為研究對象，然而讀者在書中並未看到通常所預見的對朱熹的概念體系諸如「理」、「氣」、「心」、「情」、「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已發」、「未發」等的詳加探究。儘管作者對此亦不乏興趣並有精到見解，如本書第九章「張栻的哲學與朱熹」對「心」、「性」、「仁」的探討，第十章「朱熹論天和天心：其哲學系統與修養德業的意義」對「天」、「理」的研究，但總體而言，僅是朱熹概念體系的零星研究。田浩的核心工作，在於重新揭示並嘗試復原早期道學群體的多樣性及「朱子學」研究的開放性。這種學術追求體現在《旁觀朱子學》中，就是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從朱熹所處時代的特徵及其社會關係網絡來「旁觀」朱子學。

作者的這一研究取向具有明顯的針對性：「由於學界存在一個普遍傾向，即聚焦於朱熹(1130-1200)本人的學術活動和思想，而不夠注重其內在於一個更大群體的社會網絡」(頁27)，正因如此，作者才強調把研究視角從以思想流派的「譜

系」(lineages)轉向更為廣泛、多樣的「關係」(fellowship)群體。前者凸顯一種世系的既定或權威序列，後者則突出了人群內部的水平關係與網絡。在此視域之內，作者詳細考察了社倉與書院的「人際關係」，從而得出了一個與既往研究結論截然不同的新判斷：「儘管學者通常把所謂『朱子』社倉的貢獻歸於他一個人，相比其他同時代的人，朱熹在創建社倉中最初只擔任着一種輔助性或次要性的角色。」(頁35)相比而言，地方鄉紳及地方學官如魏掞之、劉如愚、王淮等人對社倉及書院的歷史貢獻，並不在朱熹之下。

同時，針對現代學者在「社會」與「政府」的二元思路之下得出「朱熹在相當程度上是獨立於政府之外並接受很少政府幫助就重建了白鹿洞書院」(頁28)的觀點，田浩顯然不予認同。他通過考察朱熹與當時中央政府官員王淮及地方官員楊大發的關係，認為朱熹剛開始與兩人(尤其與楊大發)的關係非常緊張，經過呂祖謙的居間調停，最終取得了王淮、楊大發對重建書院的支持。然而，隨着呂祖謙這個調停者的去世，朱熹與上述二人復又交惡，他們進而成為朱熹的反對者和批評者。這個研究案例不僅有趣，同時亦耐人尋味，作者認為：「和社倉的例子一樣，朱熹重建白鹿洞書院是依靠與士大夫、政府官員以及與朱熹當地的精英和中央政府官員兩者緊密聯繫的地緣上較遠的精英所組成的網絡完成的。」(頁35)

在朱熹與呂祖謙、陳亮、張栻、陸九淵及當時士大夫官僚階層的情感交織與思想激辯中，田浩為

我們勾勒出了一幅南宋時期別樣的思想場景。

二 「異端」的歷史境遇及其思想特色

田浩的多元情懷，使得他對歷史上的「異端」所處的歷史境遇具有一種同情的了解，並能在歷史脈絡之中發掘這些「異端」的思想特色，從而給予恰當的分析和評價。在《旁觀朱子學》中，作者特別關注兩個異端式的人物：諸葛亮和陳亮。

大眾眼中的諸葛亮，更多源自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正面描繪，是智慧和正義的化身。然而，真實的諸葛亮卻充滿爭議，其歷史境遇亦隨着時代的演變時起時伏，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諸葛亮被視為獨立於儒家正統的「異端」，甚至被定性為法家的霸道式人物而加以排斥。田浩有一個尚未付諸實施的研究計劃，他說：「我還打算撰寫的一部專著中，將嘗試對諸葛亮進行更廣闊的回顧，解決更大的問題。」（頁130）而《旁觀朱子學》更多圍繞諸葛亮是否應為「儒將」的問題，關注北宋學者何去非與南宋朱熹對諸葛亮的不同評價，以及造成此種分歧的歷史原因。

何去非批評諸葛亮在丟失荊州時用人不當、考慮不周，同時指責諸葛亮一心收復中原卻無暇勵精圖治、增強實力的軍事冒險主義。據此，何去非並不將諸葛亮視為「儒者」，「儒將」亦無從談起。田浩認為，何去非的觀點深受蘇軾的政見影響，凸顯了當時蜀學所主張的小

心防禦政策和元祐年間的保守主義（頁134）。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為北宋學者的程頤卻認為「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對其評價甚高，儘管他同時也批評「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頁135-36）。這個觀點，影響到了朱熹對諸葛亮的評價，朱熹與呂祖謙共同編撰的《近思錄》完整收錄了程頤的三段話。朱熹一方面將諸葛亮與先秦法家申不害、韓非相提並論，認為他思想雜駁不純，有霸道的意味，另一方面又認為諸葛亮「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對應於朱熹所處南宋的現實，他認為「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頁139、144）。田浩認為，女真人對南宋的節節進逼這一現實困境促使呂祖謙、張栻等人將諸葛亮提升至「儒將」地位，這也同樣影響到了朱熹對諸葛亮作出更加正面的評價。這與何去非的「諸葛亮論」形成了鮮明對照（頁145）。

以儒家正統觀念來看，陳亮同樣是一個「異端」人物，田浩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給予了充分的觀照和探研。除卻《功利主義儒家》這一專著之外，田浩不斷對陳亮及其思想展開深入研究。在《宋代思想史論》中，他探討了〈陳亮論公與法〉^④，而《旁觀朱子學》則探討了陳亮的「愛國主義」及其與朱熹的普遍哲學之間的關聯，新見迭出，發人深思。

西方漢學的研究範式，基本特徵在於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人開創的「傳統」與「現代」、「帝國」與

田浩認為，女真人對南宋的節節進逼這一現實困境促使呂祖謙、張栻等人將諸葛亮提升至「儒將」地位，這也同樣影響到了朱熹對諸葛亮作出更加正面的評價。這與何去非的「諸葛亮論」形成了鮮明對照。

田浩在援引德國浪漫性的民族主義對陳亮的夷夏觀進行詮釋時，並沒有以理論框架來宰割陳亮的思想體系，而是更多觀照歷史的複雜性，從而對套用西方概念來解釋中國思想時保持嚴謹態度。

「民族國家」的二元對立框架。沿此思路，一方面，有學者以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為依據，認定力主匡復中原的陳亮具有「愛國主義」，而朱熹則被指責為「投降派」和「賣國賊」；而為朱熹辯護的學者，同樣未能逃脫這一研究理路。另一方面，又有學者主張中國古代的「帝國形態」本不具備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及「主權」觀念，就此而論，所謂「愛國主義」亦無從談起（頁147-48）。

然而，陶晉生的宋代史研究表明，宋人已經做到：「一、認知中原是一個『國』，遼也是一『國』。二、認知國界的存在。」並進而得出如下結論：「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認為傳統中國與外夷之間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力的界限』的看法。」^⑥北宋及南宋時期錯綜複雜的民族紛爭及政權關係，使得當時士大夫階層在朝貢體系與華夷觀念的背景下，「敵我」意識空前凸顯，由此既具備與現代民族主義相似的思想特質，又與西方學界經典的現代民族主義並不完全相似。

田浩認為西學學術體系中的民族主義有兩種形態，一種形態是源自法國政治性的民族主義，此種民族主義與國家建構、社會動員、民主化與現代化等現代性觀念密切聯繫；另一種形態則是源自德國浪漫性的民族主義，此種民族主義關注民族傳統、民族語言、民族血統及民族精神。陳亮基於「中國天地正氣」的思路而得出的夷夏不相容觀點，正與德國浪漫性的民族主義有着相似或共通的地方（頁149）。

陳亮的思想表明，他基於《春秋》夷夏觀的獨特理解，認定身具夷狄特徵的女真人強佔中原這一片蘊含「天地正氣」的土地的非法性，而深具「文化中國」特質的南宋卻「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對此危局，陳亮深感北伐收復中原的急迫性：「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客久安而無事也。」^⑥顯然，在陳亮看來，夷夏之間存在着無可逾越的文化和政治鴻溝，其基於傳統及種族的民族主義特徵於此得以凸顯。

這種主張，已然與韓愈所概括的孔子作《春秋》之旨不相吻合，韓愈曾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⑦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顯然更多繼承了韓愈對孔子夷夏觀的看法，比如《論語·八佾篇》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又如《論語·子罕篇》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書章句集注》釋云：「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⑧相對於陳亮的民族主義，田浩將朱熹的夷夏觀定性為「更加完整的世界大同主義」，其哲學更強調普世價值：「如果說朱熹和其他中國人更具世界性和文化性的普遍主義，陳亮可能更具民族主義色彩。」（頁168）

田浩在援引德國浪漫性的民族主義對陳亮的夷夏觀進行詮釋時，並沒有以理論框架來宰割陳亮的思想體系，而是更多觀照歷史的複雜

性，從而對套用西方概念來解釋中國思想時保持嚴謹態度。他說：「儘管陳亮對人種民眾和民族主義概念的應用確實拓寬了我們對其思想中一個重要領域的理解，但所有這些並不能將他轉變成一個19世紀德國浪漫性的民族主義的倡導者。」同時提醒讀者對以下兩種觀點持審慎態度：「其一，宣稱19世紀以前、現代西方之外，民族主義不為人所知；其二，因為陳亮情繫『中國』或者因為他要求中國加強國力面對外患的務實政見，宣稱發現了12世紀中國的『愛國主義』」（頁170），從而有力回應了學界慣常採用的帝國—民族國家二元對立研究模式。通過對現代西方學術觀念與中國思想觀念既關聯又區分的「纏繞性」特徵的審慎探討，田浩對陳亮基於當時歷史情境的政治主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評價。

唐宋以降，「道統」及「正統」觀念逐漸興起並盛行起來，諸多具有重要歷史影響的思想家在「道統」思維主導下漸次淪為「異端」被加以排斥，由於後世學者的刻意遮蔽和打壓，從而使得一些「異端」人物要麼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長期被邊緣化而無法獲得應有的重視，要麼成為後世確證道德和學術正當性的反面教材，被後世學者不遺餘力地加以批判和鞭撻。田浩本着多元與包容的學術情懷，對「異端」人物諸如陳亮和諸葛亮，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亦得出了相對公允的學術結論，在方法論的運用及學術觀點的推敲層面，都發人深思，深具感染力和說服力。

三 探討宋代思想的當代價值

《旁觀朱子學》的另外一個突出亮點，就是田浩嘗試探討宋代思想的當代價值。應該說，這種嘗試和努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與現代新儒家對心性色彩濃厚的宋明理學「接續」的思路不同，田浩更多強調儒學內部源自陳亮的所謂「功利主義」傳統，進而加強了讀者對儒家思想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多元特質的認識。

對宋代學術的繼承和發揚，一度成為現代中國學界的熱點問題，甚而有「新宋學」概念的提出。王國維曾謂：「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⑨；陳寅恪更提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⑩問題在於，所謂「新宋學」的內涵究竟是甚麼？應該繼承和發揚「宋學」的哪一部分內涵？

對此，歷史研究者與哲學研究者有不同理解。歷史學家漆俠依據鄧廣銘的學術觀點，傾向於將「宋學」視為「在對古代儒家經典的探索中，與漢學迥然不同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學風」，而「新宋學」則指「包括了哲學（主要是經學）、史學、文學藝術多個方面，涵蓋面是較為寬廣的」^⑪。與此相對照，現代新儒家依據「道統」思路，將「宋學」定性為「心性之學」。熊十力認為：「宋學一詞，本指兩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心性或義理之

與現代新儒家對心性色彩濃厚的宋明理學「接續」的思路不同，田浩更多強調儒學內部源自陳亮的所謂「功利主義」傳統，進而加強了讀者對儒家思想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多元特質的認識。

田浩通過與陳亮的公私觀和義利觀作比較，從而得出陳亮思想影響了陳煥章和澀澤榮一的結論。他們或許會表現出某些與陳亮思想相似或相近的特徵，但是其思想來源，是否一定是源自陳亮？難道就不可源自荀子甚至更遠的孔子？

學。……宋學於心性或義理方面，確有發明。」^⑩其影響所及，便是現代新儒家對宋明心性之學不遺餘力的提倡，難怪李澤厚批評現代新儒家應該稱為「現代宋明理學」^⑪。

田浩向以歷史學研究為職志，他對「宋學」的理解自然不以現代新儒家的「道統」思路為限，他更多探討宋代思想史的當代價值。朱熹是作者備感興趣的研究對象，這可以從《旁觀朱子學》的書名一窺端倪，儘管本書並不以朱熹為唯一研究對象，然而朱熹始終如影子一般貫穿於全書，形散神聚。近年，田浩數次來華，專門研究朱氏聯合會為復興朱熹思想所作的努力，對此，他從文化多元的立場給予了充分認同。他詳細介紹了朱熹後人朱杰人恢復和踐行《朱子家禮·婚禮》的詳細過程，盛讚朱杰人等朱氏後人進行的現代婚禮融入了《朱子家禮》的內涵，並將《朱子家訓》譯為英文。通過這些學術觀察，田浩認為：「從歷史上看，家庭的確是儒家傳統重要的生生之源。」（頁123）

耐人尋味的是，田浩對於朱熹並非一味讚美和認同。在朱杰人為《旁觀朱子學》所寫的〈序〉中，曾談及數次向田浩約稿而遲遲未獲回應的事，原因就在於田浩擔心自己的文章多有對朱子的「不敬」，生怕會讓身為朱子後裔的朱杰人為難（〈序〉，頁4）。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田浩對朱熹及其思想的研究所具有的客觀、審慎態度，儘管他最新的研究表明，他在多元及包容的現代觀念主導下認同復興朱子傳統的努力。

不過，田浩將陳亮思想與現代功利思想對接的學術努力，似乎更

值得讀者關注。作為對現代新儒家有關現代東亞所謂「儒家資本主義」觀點的回應，他在探討現代所謂「商人精神」時，特別留意陳煥章、澀澤榮一及台灣企業家吳火獅的思想。他以陳亮的義利觀及公私觀為標準，認為主流儒家理論和倫理對東亞經濟並未像現代學者所主張的那樣，作出了重要貢獻。恰恰相反，「吳火獅沒有從朱熹版的儒學中吸收特定的觀點，而毋寧說經常從朱熹譴責的觀念中吸收東西」（頁49），原因在於，「朱熹的正統儒學沒有強調解決儒家公、私，以及義、利之間的衝突；反而特別歌頌這種概念的人就是非主流的功利的儒家或者經世實用的儒士。雖然沒有被澀澤榮一所引用，但陳亮對追求利潤以及私利進行的倫理辯護含蓄地反映在澀澤榮一的書中。」（頁50-51）

他一再申說此種觀點：

雖然很多人將東亞經濟奇迹歸功於儒家主流思想特別是新儒家的貢獻，然而從陳煥章、澀澤榮一的例子來看，陳亮的這種「外圍」思想顯然是一個關係更為密切的積極因素。由於朱熹是批判陳亮所提倡這種思想的主要人物，我們不該再指望從朱熹身上尋求促進經濟發展的思想。（頁20）

由此，他表明儒家思想在歷史流變過程中的多元化特徵：「我希望這個具體的實例會鼓勵我們對儒家思想中不同流派的界定更加清晰，我也希望它會使我們清楚地記住歷史上的儒家傳統是多麼地多元化。」（頁20）顯然，作者關心的依然是「正

統]觀念下的「異端」思想所具有的當代價值。

當然，作者的這種判斷也具有一定的冒險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陳煥章和澀澤榮一其實都沒有明確引用過陳亮的原話，但他通過與陳亮的公私觀和義利觀作比較，從而得出陳亮思想影響了陳煥章和澀澤榮一的結論。筆者在私下交流中亦曾詢問過田浩教授，是否有文獻依據表明陳煥章、澀澤榮一、吳火獅等人「有意識地」自覺繼承和發揚了陳亮思想，他表示沒有。如此一來，可能就會帶來某些問題，比如，陳煥章、澀澤榮一、吳火獅等人或許會表現出某些與陳亮思想相似或相近的特徵，但是其思想來源，是否一定是源自陳亮？難道就不可以源自荀子甚至更遠的孔子？

不過，作者為超越現代新儒家糾結於宋明心性之學所帶來的「道統」狹隘化傾向所作的努力，是值得充分認同的，而其對傳統儒家多元性的關注，亦為我們重新認識那些被打入「異端」行列的思想家諸如先秦的荀子、韓非子與現代思想的某些關聯，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

總之，田浩的《旁觀朱子學》，不僅對當代學界的朱熹研究具有參考價值，而且對宋代思想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的探討都具有啟發意義，能夠為我們提供開闊的視野、理性的方法和良好的問題意識。正如余英時評論田浩此書：「資料是豐富的，分析是透徹的，觀點是新鮮的，文字是生動的，題材是有趣的。」（《旁觀朱子學》，封面推薦語）作為田浩的老師，余英時的這個評論確乎切中肯綮，筆者對此亦深有同感。

註釋

- ① 田浩(Hoyt C. Tillman)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 ② 田浩(Hoyt C.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增訂版於2009年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③ 余英時：〈余英時先生序〉，載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頁5。
- ④ 田浩(Hoyt C. Tillman)編，楊立華等譯：《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⑤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99、101。
- ⑥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載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
- ⑦ 韓愈：〈原道〉，載《韓昌黎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7。
- ⑧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3。
- ⑨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庵文集續編》，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頁70。
- ⑩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77。
- ⑪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3。
- ⑫ 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三，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811-12。
- ⑬ 李澤厚：〈說儒學四期〉，載《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131。

《旁觀朱子學》不僅對當代學界的朱熹研究具有參考價值，而且對宋代思想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的探討都具有啟發意義，能夠為我們提供開闊的視野、理性的方法和良好的問題意識。

宋洪兵 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